

● 陕西金石文献丛书

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

●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 李慧 主编

● 三秦出版社



● 陕西金石文献丛书

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三秦出版社

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

李 慧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

富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30印张 2插页 68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46-162-7/K·62

定价：13.00元

序 言

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曾经是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夏、西魏、北周、隋、唐十三个王朝以及刘玄、赤眉、黄巢、李自成四个农民政权的都城所在地。其中西周、秦、西汉、隋、唐五个极盛的统一王朝，皆建都于长安及其附近，时间长达九百三十九年之久。虽然几经沧桑，地表建筑早已圯废，但地面尤其是地下遗存的古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是我国一部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金石专著，其中著录的陕西金石约占全国半数以上。1976—1979年，在岐山凤雏村西和扶风召陈村的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了一万七千块占卜甲骨，有文字的二百九十二块，每块少则一字，多则三十二字。这是继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周青铜器，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得宝鼎后土祠旁。早在宣帝神爵（公元前58年）又曾出土。建国以后全省四十多个县、市共出土青铜器三千多件，多数都有铭文，最多的达四百余字。

秦代的宏伟建筑虽早已荡然无存，但遗址上的残砖碎瓦俯拾皆是。这些地表的和地下的大量陶片，许多都有陶文。单是袁仲一同志在发掘凤翔高庄秦雍城（包括宗庙）、马家庄宫殿及墓葬、咸阳牛羊村北原秦都、西安西郊赵家堡阿房宫、临潼栎阳和秦始皇陵以及韩峪附近的芷阳、洪庆憨儒乡等遗址，收集到部分秦陶文达两千余件。建国前出土的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的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有一百一十九字。这是截至目前全国出土的文字最多的瓦书。出土的还有为数极多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版、秦权以及兵器等上的铭文。出土的西汉时的文献资料，比较系统的是1980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两侧的一批木牍。出土的还有大量的汉陶文、瓦当文、纪年砖、陶瓶朱书、铜镜、铜盆、铜碟、铜洗、铜行镫等各种铜器上的铭文。此外，还有历代泥封印玺千余件。

然而，陕西省地面遗存和地下出土最多的古文献资料，还有历代的碑刻。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是全国其它省市所不及的。刻石纪事，最早为秦。还在唐初，在陕西凤翔南二十里多，就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截止1984年10月，初步统计表明，陕西古石刻共有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多条。

陕西古文献资料遗存，虽遍及全省，但多集中于古遗址附近而各具特点。西周甲骨文、金文多出土于宝鸡地区的周原及长安和户县的丰、镐一带。秦、汉陶文等多出土于古都城、宫殿及墓葬遗址。大量碑刻文献也是如此。西安碑林是保存碑刻文献最多的地方，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37年）迁入唐《开成石经》起，绵延至今，已有九百年的历史。在西安石刻较多的还有大、小雁塔。以汉魏石刻称著的石门摩崖刻字，均集中于古栈道的汉中褒斜（今已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它与略阳灵崖寺的主要摩崖石刻，

内容多是记述古栈道修筑的。唐帝王陵墓碑石较多的有三原县高祖李渊的献陵、乾县高宗李治的乾陵、富平县中宗李显的定陵、蒲城县玄宗的泰陵，但最多的还是礼泉县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建国前及建国后出土的唐人墓志约一千二百余方。耀县药王山是孙思邈的家乡及采药之地，此地保存有他的《千金要方》等刻石，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的造像石。户县祖庵重阳宫、周至县白云山、华阴县西岳庙是道教遗址，其刻石也多与道教有关。此外，永寿县卢定山的娄敬墓、神木县二郎山、陇县吴山、留坝县张良庙、扶风县法门寺、兴平县马嵬、勉县武侯祠、榆林县红石崖以及黄陵等，都有不少碑刻。至于分布在西安及全省各地的佛教寺庙遗址的名僧大德塔铭、经幢、造像石等，则多不胜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陕西省的这些古文献资料，其价值是多方面的。

一、它为研究我国汉字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国的方块汉字，可以说是从六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出现的简单文字符号开始，到秦小篆就已基本上定型。陕西地面遗存的和大量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是原始文字的雏形，而鱼纹、人面纹则是后来象形文字的祖先。这种原始文字在渭南史家、商县紫荆、西乡县红岩坝等仰韶文化遗址都有发现。其中最典型而具有代表性的，是临潼县姜寨遗址陶器上的二十二个文字符号。西周甲骨文和钟鼎文，是周人由原始氏族时代进入阶级文明时代的标志。由周的大篆到秦的小篆、再到汉隶、北魏体，直到唐的楷书（包括短暂的武周的新文字），陕西都有出土实物。在这批资料中，既有正规的钟鼎、碑石文字，也有出自庶民工匠之手的随意书写的砖瓦陶文，从中可以探索汉字的发展规律。

二、陕西遗存的大量古文献资料，为补史证史和考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周、秦、汉、唐是我国古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但西周留下的古籍较少。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和大量的金文其内容涉及到周文王到幽王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经济制度等，这就填补了古文献的缺漏。临潼县出土的利簋，宝鸡县出土的何尊，扶风县出土的墙盘，眉县出土的旃鼎，蓝田县出土的永盂，长安县出土的多友鼎等，史料价值极为重要。李学勤教授说：“一些重要的青铜器其价值各抵《尚书》一篇。”这个评价是精当的。秦统一六国前后，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留下的书面古籍也较少。其原因可能是秦在陕西的时间虽长，但统一后的时间极短，来不及写出典籍。出土的大量陶文以及兵器上的铭文、秦权铭和诏版，为史料极少的秦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80年西安北郊汉未央宫前殿遗址西侧发掘的一批木牍，1986年秋在未央宫遗址出土两万多片骨刻文字，连同大量的汉瓦当文、汉宫铜鼎铭文、纪年砖、陶瓶朱书文字、铜器，都填补了研究西汉历史的一些空白。东汉、魏晋、北魏、北周、隋朝的碑石，也为各代提供了大量史料，而众多的唐代碑刻，包括碑碣、墓志等，记载了唐代各方面的情况，其内容相当丰富，整理后，可作为《全唐文》的补注。1954年出土于西安东郊郭家滩的《唐李愬碑》，在昭陵范围内发现的《李孟常碑》，1976年高陵白家嘴村西南300米处出土的《唐东渭桥记》残碑，1978年西安出土的《唐重修内侍省之碑》，1979年长安县出土的

《唐智该法师碑》；临潼唐庆山寺遗址出土的《唐上方舍利塔记碑》，1986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的《大唐回元观钟楼铭》，都未见前人著录，是研究唐代一些重大事件难得的史料。

三、不少碑石为研究历代经济制度、生产和科学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195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的唐朱书买地券和长武出土的唐地券砖、1958年蓝田县白鹿原槐真坊出土的宋代王宗奉买地券，都是研究唐、宋土地关系实物资料。户县出土的清初孟乔坊碑，补刻有康熙十一年，用银四十三两八钱八，买地十亩九分七，以寄庄形式佃种收租的记载。这是清初“寄庄制”的佐证。1975年铜川雷家坡出土的《清炭窠碑》，载有当时铜川煤矿发展和地主、矿主剥削矿工并激起反抗的材料。

一些碑石载有历代直至民国李仪祉兴修水利的史料。唐岐山《润德泉碑记》和元、明《润德泉复出记》都记有泉水长期时涸时涌及利用它灌溉民田的情况。明嘉靖十四年的《黄河图说》，载有明中叶黄河、运河流向及治理情况。它不但补充校正了一些文献关于黄河的史实，对根治黄河也有参考价值。

记载历代桥梁和古栈道修建的碑石也不少，尤其是汉中褒斜石门的石刻，提供了古隧道建筑的珍贵材料。《石门颂》所载穿山隧道，南北长14米、东西宽3.9-4.25米、高4-4.75米。这个隧道里无钻凿痕迹，传说以火烧石之后，用醋激、水激，再敲击而成。传说中的这种方法，与唐刘禹锡的《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中：“炽炭以烘之，严醢以沃之，溃为埃煤，一簣可埽”的记述，完全一样。一千九百多年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这在世界隧道修筑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人所积累的开辟交通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借鉴。1936年到1937年，川陕公路宝鸡至褒城段，许多地段仍是沿这条古栈道修筑的。还有一批碑石载有地震的史料。大荔《韩氏家谱碑记》的注中，载有明嘉靖三十四年华县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黄河清澈，人视其底”的现象。唐修建的西安小雁塔北门门楣上，嘉靖三十年王鹤题词，记有明成化末长安地震致塔中裂尺许，而正德末地震又使其裂缝复合的史实。这些自然界的特异现象，给研究地震提出了新课题。

四、另外一批碑石，反映了历代农民起义和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著名的东汉《曹全碑》涉及黄巾起义。唐末的一些墓志则提供了黄巢起义的史料。宋《雷有终墓志》载有王小波、李顺率四川农民起义军的一些情况，安康《元牛山土主忠惠王碑》和岐山《周公庙润德泉碑》均载有红巾军的事迹。宝鸡《重修火神庙改建殿碑记》载有白莲教起义军的作战史料。西安《总督孟少保（乔芳）碑》和户县《新建安善团记》碑，载有李自成起义军进攻西安以及明王朝建立地主武装（团练）以对抗起义的史实。清刻《汉中塔儿巷碑》、《西乡水东坝洋源镇普义渡碑序》，记载有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和四川太平军蓝二顺破汉中城，攻占西乡的史料。扶风《张化龙碑》，记载了光绪年间在严重灾荒情况下，清政府增加捐税，张化龙率众抗捐并起义的斗争。以后扶风、武功等县十多万农民为他立碑纪念。宁强《李云栋碑》、《平利教案碑》，反映了人民不堪地主凭借外国教会势力的欺压，奋起反抗的事实，则是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两次重要事件。此外，还有许多碑石，反映了清末民初的革命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于右任、冯玉祥书写的大量碑石外，还有蔡元培撰文、李大钊篆额为华县龙潭农民杨耀海（陕西地质学家杨锺建之父）写的墓碑，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近代革命史的珍贵史料。

五、陕西的古文献资料，又为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出土的汉瓦当文、汉宫鼎铭文，证明了汉未央、上林、甘泉、羽阳、长乐、新丰、高平、兰池、橐泉等宫和京师仓、帝王陵以及祠庙的确切位置，建筑官署名称等。咸阳原出土的长陵瓦当、长陵宫当，不仅证实了刘邦长陵的位置，而且证实了史书未载的寝园这个建筑物确实存在过。一些碑石树立地址和墓志所标地名及出土地址，使我们借以得知古今地名的演变，而它周围地表的变化，又可使我们了解到当地自然地理的变迁。泾阳县丈八寺村渭河北岸所竖《重修广德寺碑》，有唐朝所建的广德寺院，有身高丈八的石佛像的记载，此像建国初还有残留的石佛下腿和双足。因此，可以证明这个村名的来历和它千年以上的历史。1976年在高陵白家嘴村西南300米处出土的唐《东渭桥记》，证明了从开元九年起，在至今一千多年中，渭河北移了五华里多。终南山下的户县白龙沟东南斜坡上元代所立的《重阳万寿宫下院碑》，2米高的碑身，到1957年因泥沙拥积而埋入地下0.8米。这就表明了近七百年，那里水土流失的确切情况。这些碑石作为历史的座标而起的作用，大概是树碑者意想不到的，但它对当今建设的参考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

六、陕西古文献遗存，尤其是碑石、墓志，反映了北朝至隋、唐我国民族的大融合的历史，也反映了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情况。所有这些，又是造成盛唐文化高峰的必要条件。

许多出身少数民族的将领、官员的墓碑、碑志，记载了他们在为开拓祖国疆土，在形成我国多民族国家中所作出的贡献。户县祖庵、长安、华阴、郃阳县的蒙汉合文碑，耀县的蒙文造像碑，乾县的金天会十三年契丹文和汉文翻译的《郎君行纪碑》，大荔县的回文碑，都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和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陕西还有一些出仕于唐的外籍官员的碑石、墓志。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附有古叙利亚文和希腊纪元。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主文是波斯婆罗薄文，而以汉文为副。还有以尼泊尔文与汉文合书的经幢，澄城县金明昌三年梵文与汉文合书的铁钟，西安清真寺（化觉寺）景泰六年的推算回历的阿拉伯文月碑，这些文献遗存，既是研究我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资料，也是研究外国古文字的珍贵实物。

七、陕西遗存的古文献资料，尤其是碑刻文献，为研究儒学和佛教、道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是人们长期以来研究儒学经籍的珍贵资料。自汉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在封建社会便逐渐被抬到国学的地位，几千年来影响着我国的伦理道德。从东汉至清，先后有七次刻经。陕西遗存的除了东汉熹平和魏正始石经残片外，现存有唯一完整的石刻儒学经籍——《开成石经》。这部石经，连同各地有关府学的碑石，都是研究儒学以及封建社会教育的材料。

佛教从东汉传入我国，南北朝逐渐普及，盛行于隋、唐。长安是当时我国和东方佛教的中心。因此，在关中地区遗存的北朝至隋唐碑石文献中，有关佛教的石刻数量很大。其中有名僧、大德之碑和塔铭、墓记，还有大量的经幢、石刻经槩和佛经。三阶大德禅师碑和前不久发现的淳化石窟中初唐刻的佛经，是国内稀有的珍品。1983年11月下旬在西安市西郊丰镐路一唐墓中出土的绢书经卷，26.5厘米见方，上有九个汉字和十三行梵文经咒。继1978年扶风法门寺塔附近发现的《唐中宗下发入塔铭》之后，1987年又发现《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

碑。所有这些都是研究佛教的珍贵实物。

陕西遗存的道教史料也不少。出土于东汉墓中的陶瓶朱书文字，一般都反映道教的成仙思想和咒符。这可能与汉时一度崇敬黄老之术有关。药王山现存的北朝造像石中，有北魏、北周各三通佛道混合的造像，可见当时人们是既敬奉菩萨而又敬奉太上老君的。唐李王朝与李耳攀宗，元代更立道教为国教，所以陕西各地的道观、道庵，不比佛教的寺庙少。而这些观、庵的碑石，则是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

八、陕西古文献遗存，作为我国书法宝库，早已为举世所公认。金文、陶文中的佳品以及汉《曹全碑》、石门汉魏十三品、《广武将军□产碑》、北魏《姚伯多造像碑》等，那庄重古朴的篆书，轻松流畅的汉隶，雄浑粗放的北魏体，这些出自无名氏之手的作品，早为国内书法爱好者所重视。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李阳冰、韩择木等人的原作，几乎都保存了下来。这之后还有宋徽宗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以及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宋、元书法家的作品，也有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笔迹。

根据以上简要的介绍，不难看出，系统整理陕西这批珍贵的祖国文化遗存，无论对保存和研究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对进行国内外文化交流，甚至对开展旅游事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三

系统整理这批资料，也是抢救和保护它的妥当而可靠方法之一。

陕西历史上留下的古文献资料固然很多，但因长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留下的仅是一部份。经过历代战乱和地震，不少碑石或毁于兵火，或仆倒断裂后弃之郊野，或没入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华县大地震，给关中碑刻以毁灭性的破坏。西安碑林藏《开成石经》一百一十四块，被震断裂四十块，未断者多有大块损伤。著名的华阴《唐华岳精享照应之碑》侧，清人李偕题记讲，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古碑“存于庙者寥寥数种耳”。《唐《顺陵碑》，在地震时裂倒后，又被县令为修渭堤河岸，打为碎块。清初堤决，崩出三块，1964年底张水利工地又掘得两块，1965年修文庙下水道又掘得一块，仅二百八十三字。不少名碑都是佚而复出，晋司马芳碑，据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讲，他看见此碑原在汉长安城内长乐宫北。但到1952年，西安市修下水道时，却在今市内广济街口挖出残石。

鲁迅先生说过，我国文物的厄运是，某些知其价值者盗，不知其价值者毁。陕西大量的古文献遗存，建国前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成为一些官僚、古董商谋利和外国人掠夺的对象。陕西按察使、护陕西巡抚端方，光绪二十八年搜刮了一批墓志。唐《宇文氏李夫人墓志》已存西安碑林，也为他携去。他所著《陶斋藏石记》为后人留下了北魏、北周、隋、唐墓志的文字，但志石几乎全部散佚。一些为谋求暴利的古董商，将所得碑石，转售天津，旋即流入日本。光绪年间西安出土的后秦《辽东太守吕宪墓表》，先为渭南赵乾生所得，后归端方，又归诸城王绪祖，辗转流入日本，为江藤氏所有。民国初年，汉长安城出土的《侯小子残碑》，为古董商张二姓购得，转售天津周季木，以后也流入日本。至于毁于无知者之手的，恐为数更多。据《关中石刻文字新编》载：“《唐

泰州刺史路谗墓志铭》，在咸宁出土后，乡人正要把它磨为捣衣石，一村塾先生见之，因有字，亟阻之，但已十去七、八矣。今不知所在。”这种经常性的人为破坏和风雨浸蚀，如慢性溃疡一样，其损失难以数计。

陕西的古文献遗存，早在宋代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从宋代赵明诚到明代赵崧、清代毕沅，以及民国《续修陕西通志》，不断有著录问世。这些著录除集录石刻目录外，有的还附有抄文，有的还作了考释，记述了存佚情况。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收录不全，疏漏甚多。已遭破坏或埋入地下的碑石，他们不能见到故而未曾收录，所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些见诸著录的，绝大部分已经散失。清光绪十八年焦联甲《新续渭南县志》、民国《续修陕西通志·陕西金石志》；辑录有渭南县原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石六十六通，现仅存明清的九通。1964年昭陵南十八里出土的唐《周护碑》，宋以来各金石著录未收此碑，可见宋代以前此碑早已倒仆土中，不为人知。至于建国后出土的千余方墓志，古人更不可能予以著录了。而且由于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这些著录不可能印有拓片，所以难见其本来面目。在刻石已佚的条件下，附有录文，尚可知其内容，但难免有错漏之处。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系统而准确地将这些古文献遗存整理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大量古文献遗存被发掘出来。在保护这些文化遗存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以及难于避免的自然风蚀。因此，有的石刻遭到人为的破坏，有的任凭风雨浸蚀而致文字漫没，甚至散失或濒于绝迹。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方面，我们固然也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还没有系统整理出版。现在，将这些古文献遗存系统地整理出版，既可以使其不再有人为破坏之虞，也不怕那些意想不到的特大自然灾害的损伤，使它永远传之于世，在新时期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古文献遗存长期的没有被系统整理出来，其原因一是认为整理这些资料不算科研成果，因而不屑或不愿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以致许多古文献资料长期不能与世人见面。这种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只注重加工，轻视采矿，给科研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之二是将古籍整理仅仅局限于雕本印刷或手抄书籍，对于铸于钟鼎或书写于竹木片的文字也还重视，而对于出土的陶文或石刻文字，仅仅作书法欣赏，未被重视，更不用说系统整理和出版了。其实，雕版印刷的古书，虽然是古籍整理的内容，但它始于隋唐，盛行于宋。以前的甲骨文、钟鼎文、陶文、碑石文，可以说都是不同形式的书籍。它虽然不如雕本印刷书籍那么完整而显得零碎，但它却不像雕本印刷的古书那样经过转抄刻印，鲁鱼亥豕，难免有误。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第一手资料，远比书本资料珍贵得多，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极少的古代来说，就更为珍贵了。因此，在整理古籍时，把系统整理出版这些古文献遗存，列为首要任务，就十分必要了。

四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尽快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通知》。1981年12月国务院

发出《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1982年11月3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了给各省、市、自治区的信。信中指出：要“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具有地方性的历史文献和本地某些古代和近代作者的著作，加以整理、标点出版”。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精神，1983年5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西省古籍整理编辑室（后更名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负责这一工作。接着，我们即与有关方面研究，提出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的初步规划，并将整理出版陕西省古文献遗存作为全省古籍整理的重点之一。1985年2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全省各部门发出了《关于整理出版陕西古文献资料的报告的通知》，此后，这项工作便陆续展开。

系统整理陕西省古文献遗存，是开发祖国文化遗产“矿藏”资源的宏伟工程。由于这批资料数量大，分布广，又牵涉到各个方面，倘不发挥各有关方面的联合优势，是难于完成的。这批古文献资料以石刻文献数量最大。所以我们又将碑刻作为重点，组织了近百名历史、考古、文博工作者，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此一艰巨任务。为了有计划的开展工作，初步规划分下列三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结合全省文物普查进行调查，拓印现存石刻，登记归存拓片，编辑带索引性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组织一些石刻文献比较集中的文物单位和县（市），进行编辑；第二阶段，普遍进行编辑，并选择一些科研价值较大的石刻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第三阶段，按时代、类别编辑出版一些研究成果。

截止目前，袁仲一撰《秦代陶文》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徐锡台撰《周原出土甲骨文》即将出版，王忠信编辑的《楼观台石刻》、张鸿杰等编辑的《秦都石刻》、李慧等编辑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都已完稿。正在编辑的有《高陵石刻》、汉中《石门石刻》、户县《祖庵石刻》等。这篇序言曾送武伯伦、刘学林、王翰章等同志审阅，承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编辑中肯定会有不少疏漏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吴 钢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

导 论

石刻文献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资料，正如清代王昶所言，它“囊括包举，靡所不备”。自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问世以来，金石专著相继出现，多达千余种。陕西石刻文献见诸于著录的，大约有几百种金石专著与志书。不过，至今尚未有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目录。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有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在这里建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而石刻文献又以它数量多、品类全、价值高、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的特点而独树一帜。石刻文献，是反映我国古代人民千百年来生产斗争知识和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完美工艺。就时间而言，陕西石刻文献上起周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种类而言，有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摩崖、买地券以及其它杂类；就内容而言，可以说包罗万象，涉猎极广。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包容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影响了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经书全部，被誉为中国现在硕果仅存的巨型石书，对我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作用；汉中石门石刻以及秦岭山区的大量摩崖刻石，如实地记载了秦汉以来有关蜀道开凿的始末与兴衰变化；关中各县众多的北朝造像碑石，如实地记录了北方少数民族迁移、融合、和睦相处及其宗教生活与斗争的历史面貌；道教圣地之一楼观台的八十余通石碑，生动地描述了楼观教派的兴衰史，完整的楷书《道德经》与古梅花篆字《道德经》是我国现存十三种石本《道德经》中的珍贵版本；药王山的《历代名医神碑》记录了从三皇至元代的名医一百九十八个，成为中国医学研究工作中不可多得的珍宝；近千块历代人物墓志，则成为中国历代社会、家庭、婚姻乃至行政区划、职官制度等各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陕西石刻文献还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宝库，这是举世所公认的。石刻文献的雕刻综合性特征，又使许多古代雕刻艺术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如碑刻两侧的图案花纹，有的富丽，如三月花苑；有的奔放，如惊兽疾行；有的对称严谨，如一首工整的律诗；有的委婉直上，又象一曲悠扬的乐章，无不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及艺术大师们的高超技艺，为我们研究古代雕刻艺术和装饰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陕西石刻文献中，还有不少反映中外文化关系的作品；还有不少碑石为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展现陕西石刻文献的概貌，使研究者能够按照目录索取所需，易于查找，使陕西石刻文献更好地为祖国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确系事在必行了！

我们编写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一书，收录了二十四部金石专著和六部志书中所列建国前发现和出土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由于陕西石刻文献见于几百种金石专著与志书，限于人力、物力与时间，不可能将这些书都收集整全，因此在编辑时，我们选了三十种有特色且是陕西石刻文献较集中的著作，进行汇编。如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有着开创意义的专著；王昶的《金石萃编》，是“在金石著录家

可谓集其大成”（清代叶昌炽语）的专著；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是继王昶《金石萃编》之后又一集金石学大成的专著，就规模范围而言，也是唯一能与王书抗衡的书；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关中石刻文字新编》、毕沅的《关中金石记》、罗振玉的《昭陵碑录》、武树善的《陕西金石志》等，都是对陕西石刻文献有研究成果的专著。

在这三十部金石专著和志书中，我们共收陕西石刻文献目录三千一百六十一条，其中先秦五，两汉三十三，魏晋南北朝一百三十二，隋七十五，唐和五代一千六百七十九，宋七百九十三，元一百八十三，明一百三十五，清一百二十六。从类别上看，有碑石（碑刻或石刻）、石阙、浮图、墓志、碣、塔铭、造像、经幢、摩崖。在归类时，我们把碑刻和石刻归为一类，主要考虑到题名归在碑刻或石刻哪一类都不尽恰当。因为有些题名是刻于碑上的，有些是刻于一般石上的，若知其刻于何地还比较容易归类，否则就很难归类，故我们将碑刻与石刻统归为一类。在收入的三千多石刻文献中，碑石二千二百八十二，墓志四百四十八，造像一百六十九，经幢一百三十五，塔铭九十三，摩崖十三，碣九，浮图八，石阙三，买地茆一。在历代石刻中，唐代石刻的数量是首屈一指的，应该说它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缩影。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宏伟气象，还可以看到经丝绸之路，将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输入欧亚的情景。特别是造纸术、火药、炼钢术、炼丹术、指南针传至欧洲，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另外，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师的墨迹，吴道子的绘画，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孙思邈超越前人的医术，玄奘翻译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佛经等，都在这些石刻中有所反映。本书收集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共包括八十一个州、府和县，其中属于古长安地区的大约有一千六百八十馀通，占全陕西石刻文献总数的一半以上。我们知道，约从公元前11世纪起，曾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王朝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不难看出，王朝都城所在地的石刻数量最多，这不仅显示了古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而且反映了古长安在古代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编排过程中，我们以时代先后为顺序，每条目录下都有标目、原题、又名、刻立年代、撰者、书者、书体、存放地点、型制、尺寸、行款、抄录全文出处、著录出处等，兼顾地域类别。涉及如此多的项目，是以前石刻目录书中没有的。其所以如此，是想通过这些介绍，使读者可以略知每一石刻的外形特征、发展变化等，从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研究信息。如汉中的《袞雪》石刻，我们是这样编写的：

袞雪

魏建安二十四年（219）书，曹操隶书。

原刻于褒城县石门南褒河水中大石上，1970年凿迁于汉中市博物馆。

摩崖二字横列，各方二尺。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第二次来汉中，与刘备战，败退褒谷口，在褒河水中大石上横题“袞雪”两字，后人又在石尾直题隶书“魏王”两小字。摩崖在深涧之中，急湍乱石，浪沫若雪，故名袞雪滩。

著录见：《八琼》卷一一〇、页一〇；《陕志》卷五、页七；《续通》卷一三九、页七。

在这条目录里，我们简洁地叙述了曹操题“袞雪”的原因，这对研究曹操生平、思

想及性格特征等，无疑是有用的资料；我们清楚地交待了石刻的变迁情况，这对读者考察原刻也提供了方便。

再如周至县楼观台的《道德经》碑石，我们是这样编写的：

古文道德经

又名“道德经”、“元篆书道德经”。元至元辛卯（1216）刻。

高 翱古篆文、序、跋、额题“道德经”三字。

原在周至县楼观台，现仍存周至县楼观台。

共刊四碑，第一、二碑连额高九尺五寸，广四尺，各三行，行五十五字。第三、四碑无额，高八尺二寸，行五十四字。第三碑广二尺九寸，二十九行。第四碑广二尺九寸，十一行。序三行。跋六行。

著录见：《铙华》卷六六、页一六；《天志》页六五；《寰录》卷一一、页五；《关记》卷八、页七至八；《西志》卷七三、页九；《陕志》卷二七、页二五至二七；《续通》卷一六一、页二五至二七。

通过这条目录，读者可知“道德经”的全文和序以及跋都是用“古篆”写成，这对研究古文字可以说是极好的材料；通过石刻的型制、尺寸、行款等，可粗知“道德经”碑的外观；值得庆幸的是此碑现仍存周至县楼观台，这对“道德经”不同版本的考证以及对老子生平及思想的研究都是可借鉴的资料。总之，《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力争能起到导游图的作用，使读者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促进各个科研领域向前迈进。

在编辑《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时，我们按旧著录编写。对于这些文献中，已发现的一些错误，都作了说明。如《广武将军□产碑》，《关中金石记》、《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金石萃编》都记为在宜君县，《陕西金石志》则记为在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实际上后者是正确的。《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碑，《碑帖叙录》言“石已漫患，毁于汉中修道……”。实际上此摩崖石刻1970年移存汉中博物馆。《华岳精享昭应碑》原在华阳县西岳庙，现仍存华阳县西岳庙，刻在“北周华岳颂之阴”，但《碑帖叙录》错记为“现存西安碑林”。再如，《翠峰亭记》碑，《金石续编》、《陕西金石志》等历代旧著都误记为天宝八年（749）三月所刻的唐碑，实际上此碑是宋嘉祐年间王震所刻。只是因为此碑刻在唐天宝年间所刻《宴游记》碑旁，所以历代都误为唐碑。对此，我们均作了说明。本书所收目录均限在今陕西境内的。基于古今地理划分的不同以及古人著录石刻时的某些误记，我们在编辑《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时，对古代属于陕西境内今天已不属于陕西境内的石刻文献都全部删除。如宋人陈思的《宝刻丛编》，把河中府的《唐蒲州刺史裴宽德政碑》、《唐禹庙题名》、《唐禹庙颂》等碑，都归为陕西。这是因为宋朝称陕西为“陕西路”，陕西路统京兆府、河中府、凤翔府。但拿当今的地理划分来看，宋河中府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而所管辖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今天的山西省境内。再如《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把碾伯县（今甘肃）的《陇右节度使阴公修峡路记》碑归为陕西，《关中金石记》、《寰宇访碑录》把平凉府（今甘肃）的《宝庆寺记》碑归为陕西，《宝刻丛编》把解县（今山西）的《唐赠太师裴光庭碑》、《唐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唐安邑县新亭记》等归为陕西。以上我们都不再收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的编辑中错误一定不少，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负责人吴钢同志、陕西师大副教授刘学林同志、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员王翰章同志进行了审阅，我们在这里表示感谢。

李 慧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

凡 例

一、本书收录了二十四部金石专著和六部志书中所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发现和出土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现和出土的石刻文献目录，我们准备另行编辑。

二、本书是一部带有索引性质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专著。共收目录三千一百六十一条，包括碑石（碑刻和石刻）、碣、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石阙、摩崖、买地券等。

三、本书所收石刻文献目录，是按其刊立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

四、本书在收录石刻文献目录中以《陕西金石志》为底本，凡《陕西金石志》著录过的均以该书的目录标目；该书未著录的，则据其它专著目录标目。

五、本书所收的每条石刻文献目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原题”与“又名”的处理方法。“原题”均按旧著录照录；其它金石著作中的标目，与本书标目不同者，均在“原题”后以“又名”列出，包括一些俗名在内。

2、关于刊立时代的表述，其中包括朝代、年号，并在括号内标明公元纪年；有的著录对刊立时代记载不同的则加上括号说明某书为某；凡金石著作中所记“年月缺”、“年月泐”、“无年月”等，本书一律写作“年月不详”。

3、撰者、书者、书体、额题以及刻者等，均按金石著作照录，说法不同者加括号说明。

4、关于石刻原存何处、变动情况、现存何处的问题。凡记载不同者加括号说明某书为某；原存地点均依旧著记载的地点，且一律用旧称；古今称谓不同者，不加说明；现存地点不明者，不加说明。

5、石刻的型制、尺寸、行款及有关情况，均按原金石专著或志书照录。照录时以《陕西金石志》为底本，若《陕西金石志》未著录，则按其它专著；若记载不同者，加括号说明某书为某。

6、凡石刻录有全文的，本书均指出在金石专著或志书（用简称）中卷某、页某有著录。

7、凡未录有全文的，本书只指出在金石专著或志书（用简称）中卷某、页某有著录。

8、以上七项，凡金石专著及志书中缺某项者，本书不另加说明；若旧著录中指明某项不详，本书酌情采纳。

六、本书对收录的二十四部金石专著和六部志书的书名，在收录引用时作了简化，全称与简称附于本书之后。

七、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本书后附有笔画索引表。

目 录

阳虚岩壁二十八字	上古	年月不详	(1)
嵒冢禹碑	夏	年月不详	(1)
周宣王石鼓文	秦	年月不详	(1)
秦诅楚文	秦	年月不详	(1)
峰山刻石	秦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	(1)
石门	汉	永平四年(61)	(2)
开通褒斜道石刻	东汉	永平九年(66)	(2)
后周华岳庙碑	东汉	元和二年(85)	(2)
王稚子阙	东汉	元兴元年(105)	(2)
汉李昭碑	东汉	元初五年(118)	(2)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	东汉	永建元年(126)	(2)
西岳庙神道石阙题字	东汉	永和元年(136)	(3)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东汉	永和二年(137)	(3)
司隶校尉杨孟文颂	东汉	建和二年(148)	(3)
汉苍颉庙人名	东汉	延熹五年(162)	(3)
苍颉庙碑	东汉	延熹五年(162)	(3)
西岳华山庙碑	东汉	延熹八年(165)	(3)
汉杨公使传记	东汉	建宁二年(169)	(4)
李翕析里桥郾阁颂	东汉	建宁五年(172)	(4)
司隶校尉杨淮表纪	东汉	熹平二年(173)	(4)
石经残字	东汉	熹平四年(175)	(4)
仓颉碑额卫□开题名	东汉	熹平六年(177)	(4)
汉庠(一作斥)彰长断碑	东汉	熹平六年(177)	(5)
汉樊毅修西岳庙复民赋碑	东汉	光和二年(179)	(5)
汉樊毅西岳华山亭碑	东汉	光和二年(179)	(5)
汉禹庙碑并阴	东汉	光和二年(179)	(5)
汉龙门禹庙题碑	东汉	年月不详	(5)
郾阳令曹全碑	东汉	中平二年(185)	(5)
汉永乐少府贾君阙铭	汉	年月不详	(5)
郭仲理石椁题字	东汉	年月不详	(5)
汉司徒刘奇碑	汉	年月不详	(5)
汉华岳庙碑	汉	年月不详	(5)
华岳庙残碑阴	汉	年月不详	(5)
汉四皓神位刻石	汉	年月不详	(6)
汉朝侯小子残碑	汉	年月不详	(6)

云房	汉	年月不详	(6)
石虎	汉	年月不详	(6)
仙人唐公房碑	汉	年月不详	(6)
袞雪	魏	建安二十四年 (219)	(6)
魏大殓碑	魏	延康元年 (220)	(7)
十八字残碑	魏	黄初五年 (224)	(7)
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	魏	正始年间	(7)
后魏石门铭	魏	正始元年 (240)	(7)
李苞通阁道题名	魏	景元四年 (262)	(7)
十三字残碑	魏	年月不详	(7)
犬将军颂断碑并阴	魏	年月不详	(7)
杜景达墓记	魏	年月不详	(7)
邑子李映超等造象记并碑侧	魏	年月不详	(8)
僧擢造象题名	魏	年月不详	(8)
何文义造释迦像铭	北魏	年月不详	(8)
王怀忠二十六人造像题名	北魏	年月不详	(8)
惠訖造玉弥勒像铭	北魏	年月不详	(8)
比丘僧□道轨等十六人题名	北魏	年月不详	(8)
永乐县□王□造观音座像	北魏	年月不详	(8)
魏姚树等题名	魏	年月不详	(8)
曹真残碑并碑阴	魏	年月不详	(8)
黄初残碑	魏	年月不详	(9)
潘宗伯等造桥格题名	晋	泰始六年 (270)	(9)
晋王猛碑	晋	年月不详	(9)
咸阳兰亭序	晋	永和九年 (353)	(9)
邓太尉祠碑	前秦	建元三年 (367)	(9)
广武将军□产碑	前秦	建元四年 (368)	(9)
吕宪墓表	后秦	弘始四年 (402)	(10)
将军柱国史公石像铭	北魏	延和元年 (432)	(10)
大代修华岳庙碑	北魏	兴光二年 (455)	(10)
后魏崔浩碑	北魏	兴光二年 (455)	(10)
韦公武题名	北魏	太和四年 (480)	(10)
宕昌公晖福寺碑	北魏	太和十二年 (488)	(10)
姚伯多造像记	北魏	太和二十年 (496)	(10)
松滋公元萇振兴温泉颂	北魏	年月不详	(11)
北魏冯种育等二百人造像	北魏	正始二年 (505)	(11)
邑子冯神等二百二十人造像	北魏	正始二年 (505)	(11)
石门铭	北魏	永平二年 (509)	(11)
石门题字	后魏	年月不详	(11)